

神圣的寓意

张立新 著

——《诗经》与《圣经》
比较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7.22
3g

60

1207.22
Z339

神圣的寓意

张立新
著

——《诗经》与《圣经》
比较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森
封面设计：丁群亚
责任校对：段建堂 何传玉

神圣的寓意
——《诗经》与《圣经》比较研究
张立新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新星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2 千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1068-096-X/I·73
定价：14.00 元

序

张文勋

比较文学在我国传播，已有数十年历史，然而，其发展迅速，影响扩大，成为当代显学之一，还是近二十年间的事。无疑，这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形势是分不开的。从50年代到十年浩劫，我国长期处于被人封锁和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到“文革”期间，莫说是西方文化，连自己国家的文化，也都当作封资修而被废弃了。从80年代起，经过拨乱反正，国门对外开放，国人放眼世界，耳目一新，认识到世界科学文化，正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必须去认识世界，吸收新知，同时也要以崭新的视角去认识自我。既不是盲目崇洋媚外，也不是封闭排外，而是要重新学习研究，吸取人类一切先进的文化知识为我所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于是，中西比较研究之风大盛，而比较文学研究尤为盛行。比较不是简单的现象类比，而是要从文化精神实质上，作深入的剖析比较。人类世界千差万别，多彩多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所以，比较其差异，方可见彼此之长短，以便取人之长，弃我之短。但是，人类又有其共性的一面，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因子中，具有可以沟通和融合的基础。因此，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交流与互补，

而不是互相排斥；中西文化之间应该是对话而不是对抗。张立新君之所以把西方的《圣经》和中国的《诗经》作比较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要透过这两部作为中西早期文明标志之一的著作，去考察中国和西方文明之异同。中西文明从它产生和形成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差别，但作为人类精神财富，它们之间又有许多惊人的共同之点。这在《诗经》和《圣经》中，表现得极其明显。立新选择了这两部“经”作比较研究，对我们今天研究中西文化和文学来说，是溯本追源的工作。就人类学的意义上说，《诗经》和《圣经》都透露出中西两个世界的先民们的迁徙、发展、形成的信息，表现出人类先民们为生存和发展，在与自然的抗争和人际关系的演变中，形成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在这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各自走过不同的道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看，《诗经》和《圣经》都具有文学作品的特点，但都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之所以都被尊奉为“经”，乃是由于它们在不同的国度里，反映出人们视为神圣的某种文化意识和社会理念。《圣经》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基督教徒们把它奉为经典，充分体现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及其社会政治的功能。而《诗经》中虽然有一些神话痕迹，但它却充满现实主义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务实精神，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等级观念和伦理精神，它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从文学的角度看，《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样，源远流长。但由于《圣经》和《诗经》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意识和语境也不同，故其影响所及以及形成文学传统也不同。无疑，把这两部作品作深层次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西文学传统，作从源到流的考察，这是很有意义的。

立新对这问题的研究已有多多年，书中不少篇章已陆续在一些学报发表。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因而获得奖

励。现在，经作者整理修订，作为专著出版，更可看到其系统的观点和论述的全貌，这是我国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的新收获，对《诗经》研究这门古老的学问，也开拓了新的思路，注入了新的血液。应该说，这也是本书的独特的学术价值之所在。立新长期在师专工作，教学任务繁重，能抓紧时间做学问，取得不少成果，实属不易，本书的出版，的确值得祝贺。

1999年5月20日于云南大学

目 录

序	张文勋 (1)
导言	(1)
第一章 作为文学的《诗经》和《圣经》 ...	(5)
一 民族兴衰的史诗	(5)
(一) 民族迁徙与民族文化心态	(10)
(二) 民族英雄身上的耀眼光环和悲剧色彩	(16)
(三) 民族苦难中萌生的理性之光	(21)
二 “国风”和《雅歌》中的欲爱世界	(44)
三 比兴和寓意	(56)
(一) 比兴与“诗三百”创作	(56)
(二) “寓意”与《圣经》创作	(65)
第二章 儒教和基督教的神圣经典	(76)
一 《诗经》和《圣经》中的宗教意识	(76)
二 儒教圣典	(89)
三 基督教神典	(93)

第三章 汉儒比兴解诗和中世纪寓意解经 ...	(96)
一 比兴解诗和寓意解经的由来	(96)
二 中西释经之指归	(102)
第四章 “圣”与“神”	(123)
一 从孔子和柏拉图说起	(124)
二 乌托邦与功利主义	(127)
三 乌托邦与美善统一	(133)
四 理念论和意象论	(141)
五 征圣与崇神	(145)
六 讽谏和讽喻	(152)
第五章 对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159)
一 比兴解《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161)
二 寓意解“经”对西方文学发展的影响	(171)
结 语.....	(180)
后 记.....	(181)

导 言

《诗经》和《圣经》(HOLY BIBLE)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两部伟大作品。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但它们同样地表达出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追求。从内容上看，这两部作品显示了相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学的、民俗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厚重和深远。本书以比较文学的眼光去看这两部作品，去研究这两部作品的接受史。在笔者眼中，《诗经》和《圣经》都是伟大的文学巨著，它们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特定时代民族文化精神的晶体，又是古代人类心灵的回声。民族的文化精神或许有异，人类的心灵则必能相通，这也正是我们要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

《诗经》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圣经》则成为西方艺术能源的巨大宝库，它们分别对中西方文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大概是其它任何作品都难以企及的。这固然是因为这两部作品本文的博大精深，但同时也与它们分别被奉为儒教和基督教的神圣经典这一历史命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人们一般说儒、道、佛三教合流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但其实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学本是西周正统文化的传承，虽曾一度式微，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竟支配了中国社会二千余年。那些靠玩弄权术争夺统治霸权的帝王和官僚们或许只是把儒学挂在嘴上，用它来装点门面，但就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讲，儒学的浸润却是透及骨

髓的。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的滥觞滋养了儒学的生成和发展，儒学反过来又给中国文学发展以极深刻的影响。人们一般又把基督教文明看成西方传统文化的代表。融合了两希（希伯来、希腊）文明的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被奉为国教，处于独尊的地位，这使它的影响迅速扩大，《圣经》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典籍。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对教会的黑暗和僧侣的腐败进行了揭露，对神权进行了冲击，但并没有反对宗教本身。相反，基督教的一些思想精华，如真、善、美；平等、博爱、正义等等观念以及象征主义的美学原则却被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所继承，给后世西方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以十分深远的影响。直到近现代，尽管在西方发生过尼采对基督教价值观的“重新估定”，在中国发生过“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运动，但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似乎还方兴未艾。这样一个事实使得我们在研究中西方文学思想发展史乃至对整个中西文化精神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不得不对作为文化经典的《诗经》和《圣经》文本及其分别在汉代和中世纪的接受史给予特别的关注。《诗经》和《圣经》文本中存蓄了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大量信息，而中国汉代和西方中世纪分别对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新起点。而这中间尤其令人瞩目的就是汉儒的解《诗》和中世纪教父的解“经”，因为儒家的文学思想正是在汉儒解《诗》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而基督教的美学思想也是在教父解释《圣经》的过程中逐渐趋于成熟的。那么，我们通过对《诗经》和《圣经》文本的对照，通过对汉儒解《诗》和中世纪教父解“经”及其影响作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方文学思想和审美思维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特征，并进而看到中西文化精神的分途发展及其会通之处。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现代解释

学、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的接受活动绝不是一种单向的被动行为，它包含着本文和接受主体的双向交流，接受主体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理解意识之中，它与解释者的审美经验和美学情趣有直接联系，这也就是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的意思。同时，对本文的接受又往往受到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我们一般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不仅是讲自然的地理条件对人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指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生命个体的精神文化视野是一个限制。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文学接受中的差异性和时代共性特征。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美学思想的混和纠结，是汉代和中世纪学术的共同特征，汉儒和中世纪教父对《诗经》和《圣经》的接受也表现出诸多惊人相似之处与明显的差异。本书不愿意对汉儒解《诗》和教父解“经”持简单否定和指斥的态度（如瞎子断匾之类），尽管他们的一些解释是我们所无法认同和难以接受的，但我们更愿意把指斥变为理解。我们把汉儒解《诗》和教父解“经”放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研究，通过比较汉代和中世纪文化大背景上的相似、相通和相异之处，来理解汉儒解《诗》和教父解“经”的异同。通过这样的参照，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艺术理解的历史经验。

近年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的宗旨及方法论作过诸多有益的探讨，诚如四川大学曹顺庆先生所言，从根本上说来，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于跨越和沟通，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重重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跨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优势所在，

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欧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① 乐黛云先生则进一步把比较文学的目标定位为建设 21 世纪的人文精神。这种新的人文精神是“以人的幸福和文化的和平多元共处为根本目的。”所以，比较文学必须通过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② 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意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研究者内心深切的人文关怀，比较文学研究也因此突破了纯文学的领域而扩展到了文化研究的范畴。要而言之：即便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古典的东西，也必须有益于当代的文化建设；即便我们志于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必须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在 21 世纪的“地球村”里，异质文化在碰撞之中逐渐走向沟通乃至融合，似乎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可以预见，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和交流，必将成为未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而比较文学所具有的互识、互证、互阐、互补之功，将会大大有益于这种对话和交流。我想，鉴于《诗经》和《圣经》在中西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我们对之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完全可以为中西方跨文化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一个较为典型的范例。

① 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见《中国比较文学》1995（1）。

②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 21 世纪人文精神》，见《中国比较文学》1998（1）。

第一章 作为文学的《诗经》和《圣经》

一、民族兴衰的史诗

《诗经》和《圣经》是不是史诗？或者说它们是否够格称之为真正的（正式的）史诗？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大师黑格尔就曾将它们双双关闭在“正式史诗”殿堂的大门之外。黑格尔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他又这样论及犹太圣经：“在创世的观念，长老的传记，埃及沙漠中的流亡，迦南的征服以及后来民族事业的发展，加上生动鲜明的直觉力和忠于自然的掌握方式，固然向犹太人的崇高的想象力提供了许多原始史诗所需要的因素，但是宗教的旨趣在犹太人中间压倒了一切，所以他们所成就的不是真正的史诗，只是些半宗教半诗艺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以及一些带有宗教教训的故事。”^①显然，《诗经》和《圣经》似乎都不配堂而皇之的走进黑格尔把持的艺术正殿，因为中国人的宗教观点“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而犹太人却让“宗教的旨趣压倒了一切”。中国人和犹太人似乎因为各自走了一个极端而与史诗无缘。然而，《诗经》和《圣经》毕竟被很多学者认定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尽管其中的神话色彩或淡或浓，宗教意识或弱或强，所描绘的历史事件或略或详，艺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1，170、172页。

术表现手法也与荷马史诗有种种不同，但它们毕竟是以诗的（艺术的）手段再现了“某一确定范围的现实生活”，反映出“某一确定的民族的世界”，对“表现在伦理的家庭生活、战争和平时时期社会生活情况，乃至需要、技艺、习俗和兴趣等方面的民族精神”，都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形成了多层次多侧面描绘社会生活的巨幅历史画卷。^①如果我们不是先入为主地把荷马史诗看成是唯一的正统的史诗标本，而是从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承认民族史诗的独特风格，那么，《诗经》和《圣经》从总体上看无疑都构成了民族的伟大史诗，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艺术的表现手法反映了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面貌，其中深刻地蕴含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比较看重历史的，“以史为镜”几乎成了士大夫的口头禅，而文学，也常常被看成社会的镜子。千百年来，尽管历代学者对《诗经》具体篇章的解释存在种种不同的看法，但《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滥觞，这一论断至今可以说是不易之论了。现代一般学者都认为：《诗经》中的诗篇大约产生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前6世纪）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其最早的作品要算“邶风”中的《破斧》，诗中提及周公东征之事；最晚的作品是“陈风”中的《株林》，是讽刺陈灵公和夏姬淫乱的。就诗篇所涉及的内容看，除了“商颂”五篇是春秋时代宋人写来祭祀殷族祖先的诗歌外（也有人认为是商朝遗留下来的祭歌），其余三百篇，均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周民族从崛起、强盛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面貌。《诗经》反映出周代历史状况的诗篇大致有三种类型：首先是那些以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民族英雄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叙事性史诗，如《生民》、《公刘》、《绵》、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1，122页。

《皇矣》、《文王》、《大明》等。诗人以满腔的热情，描绘民族创业的伟大历程，歌颂那些为民族的繁荣和进步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英雄。另一类是那些以平凡的小人物为描写对象，表现他们的不幸境遇，表达他们的哀怨之情的诗篇：丧失了自由，也丧失了人的尊严的奴隶，在不幸的婚姻生活中挣扎的妇人，地位低下的士兵……他们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似乎永远只是帝王和英雄的一种陪衬；他们受尽了生活的磨难，受尽了欺压和凌辱，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确乎一钱不值，但他们的生活有时往往蕴含了更深刻的历史内容，他们的喜怒哀乐往往更能反映时代的风貌。如《七月》、《东山》、《采薇》、《氓》、《谷风》等名篇，或写农桑稼穡之事，或写战士的军旅生涯，或写下层妇女不幸的婚姻，绝无粉饰，读来真切动人。这种内容在希腊史诗和以色列史诗中都是见不到的，从而形成华夏史诗的一大特色，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层面上表现了历史的真实。除了以上所言这些以叙事为主的诗篇之外，《诗经》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和周代历史紧密相关，这些诗歌从表达方式上看似应归入抒情诗的范畴，但是，由于它们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很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要了解周代社会历史状况的全貌就必须关注这一部分诗歌，它们是周代史诗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缺少了它们，所谓“历史面貌”就将是残缺不全的。这类诗歌与史实的联系有的是诗人在诗中已点明了的，如《破斧》中说“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采薇》中说“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正月》中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还有的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如《秦风·黄鸟》，《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其它如周公所赋的《鸛鸣》，许穆夫人所赋的《载驰》，卫人赋《硕人》，郑人赋《清人》，诗篇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历史

故事。这一类诗歌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笔锋犀利的被称为“变风”“变雅”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以批判现实直面人生的态度，无情地剥去了那些腐败了的王公贵族们身上的画皮，掀开了黑暗政治最丑陋的角落，让他们的劣行败迹暴露出来，把历史的真相赤裸裸地昭示给后人。正是这三种类型的诗篇——直接以周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民族英雄为描写对象的叙事诗，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叙事诗和那些与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紧密相关的抒情诗，合成了绚丽多姿的巨幅历史画卷，这一巨幅历史画卷是由无数诗人在五百多年漫长的岁月中所共同绘制，我们在其中完全可以看到周民族的兴衰史，感受到民族精神的伟大与卑微。

犹太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在近代历史上，这个民族产生了那么多对世界发生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涅、卡夫卡……然而，犹太民族的历史却充满了苦难、屈辱和哀伤，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我们知道，基督教《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新约》的创作是基督教兴起以后的事情，其内容多半是耶稣传道的故事和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事迹，而《旧约》却是基督教从犹太文化继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它的创作与犹太民族的历史紧密相关，更集中地体现着犹太民族的文化精神。

似乎每一个民族在文明初始理性萌发之时都要寻根：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犹太圣经第一部《创世记》开宗明义就在寻以色列民族的根：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始祖，亚伯兰（亚伯拉罕）则是以色列民族的始祖。亚伯兰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世纪，比中国历史上的公刘约早三世纪。亚伯兰率族人离开哈兰，渡过幼发拉底河到达迦南，因此他的后代被称为希伯来人（即来自河那边的人），后经雅各把族名改成了以色列。列祖时代的以色列人似乎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伟业，也没有丝毫所谓英雄气概。

亚伯兰和他的儿子以撒为了能在动荡不安的游牧生活中苟全性命，都不得不以牺牲妻子的贞操为代价。雅各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个精明聪慧善用巧计的人，用一碗红豆汤换得长子的名分，又略施小计骗得父亲的祝福，为逃避兄长的报复，在舅舅家打了二十年的工，却与舅舅的两个女儿及其使女生了一十二个儿子。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约瑟，也不过是一个智者加幸运儿的合体，蒙上帝的恩典，他不仅能够因祸得福，而且还给全体族人带来福分。

犹太民族历史壮丽辉煌乐章是从摩西开始谱写的。摩西带领 60 万以色列大军义无反顾地走出埃及，到据称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流奶和蜜之地”去，四十年的征战和漂泊，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正是民族精神和品格的第一次锻造。摩西不仅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和领袖，更成为一文化伟人，“摩西五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以色列民族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第一块奠基石。而后，经过士师时代、扫罗王朝，以色列王国进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大卫和所罗门时代。大卫具有雄才大略，他率族人战胜了非力士人，把南方的犹太和北方的以色列统一起来（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后，住在北方的称以色列部落，住在南方的称犹太部落），成为希伯来联合王国，迁都耶路撒冷，然后南征北伐，东西扫荡，四邻宾服，国势空前强大。《圣经》上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華都使他得胜”，所以，大卫被称为“得胜之王”。到所罗门继承王位之时，以色列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繁荣时期，所罗门被称为“平安之王”，在他的治理下，国富民强，达于鼎盛：

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辖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土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事他。……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王上 4）

似乎是回应着中国先民“物极必反物盛必衰”的认知方式，以智